



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中华文学传承发展研究中心

西方哲学与 中国新诗

雷文学◎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西方哲学与 中国新诗

雷文学◎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詹素娟
装帧设计:东方天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哲学与中国新诗/雷文学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5
ISBN 978-7-01-020723-0

I. ①西… II. ①雷… III. ①西方哲学-影响-诗歌-创作-研究-中国
IV. ①I207.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76676 号

西方哲学与中国新诗

XIFANG ZHEXUE YU ZHONGGUO XINSHI

雷文学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8.25

字数:330 千字

ISBN 978-7-01-020723-0 定价:7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福建师范大学
中华文学传承发展研究中心

项目名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西方哲学与中国新诗》

项目批准号:11YJA751031

总序

2004年10月,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获批建设福建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人文福建发展研究中心,并于2011年评为省高校优秀社科研究基地。在此基础上,学校于2014年4月成立了中华文学传承发展研究中心,聘任郑家建教授为研究中心主任,以更好地发挥文学院在中华文学传承发展方面的科研优势,为我国社会文化发展以及闽台文化合作交流提供智力支持和决策参考。该研究中心于2014年6月经过专家评审,成功晋升为福建省首批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福建省社科研究基地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层次学术平台,担负着组织科研创新团队、产出重大研究成果、创新科研管理体制机制、提供社会咨询服务、培养优秀科研骨干、促进学科建设发展的重任。省社科基地实行“机构开放、人员流动、内外联合、竞争创新、产学研一体化”的运行机制,经过几年的建设,力争成为国家或省级高层次智库或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中华文学传承发展研究中心依托福建师范大学国家重点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福建省特色重点学科(中国语言文学)和3个福建省重点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以及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点和博士后流动站、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点和博士后流动站、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点和博士后流动站,以学科发展与

社会重大问题为导向,结合文学院的既有学术传统,确定中心的重大学术课题,围绕国家提高文化软实力与福建省社会文化发展的重大需求,在全球化语境中传承与创新中华文化。

中国语言文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它不但成了联结全球华人共同家园的精神血脉,而且对中华文化在世界的流播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国语言文学在传承中华文明及促进闽台文化的合作交流方面具有其他学科无可替代的作用。福建师范大学中华文学传承发展研究中心的学术宗旨,是以历史和现实为基点,对涵盖古今的中国文学,尤其是闽台语言、文学及海外华文文学的渊源流变进行全方位的梳理,为当前建设繁荣和谐的社会文明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加深两岸人民共同构建精神家园的情感联络,为促进闽台文化交流与中外文化交流做贡献。

研究中心聘任国内著名专家担任顾问和学术指导,对中心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指导。福建师范大学副校长汪文顶教授担任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副校长郑家建教授担任中心主任,研究中心的日常事务工作由常务副主任葛桂录教授负责。本中心的特色研究方向有四个:闽台语言文献与文学交流研究方向,负责人为林志强教授、郑家建教授;文体学研究方向,负责人为李小荣教授;中华文学域外传播研究方向,负责人为葛桂录教授;当代文学教育及语文教育研究方向,负责人为赖瑞云研究员。

研究中心将以国家社会文化发展的重大需求为导向,以研究项目为纽带,以研究方向组成的创新团队为载体,以出精品成果为目标,努力强化特色与优势。联系整合省内乃至国内相关高校、科研机构的学术资源,建立健全协同创新机制,造就一支高水平、结构合理和可持续发展的科研创新团队,打造一个在全球化语境中传承与创新中华文化的重点研究基地,成为全国有影响力的专门人才库和人才培养培训基地。

为促进研究中心建设目标的实施,我们在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集中出版“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福建师范大学中华文学传承发展研究中心学术集刊”。该集刊主要收录研究中心同仁高质量的个人学术著作。列入研究中心学术集刊首批出版的十本著作,绝大多数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如

《晋唐佛教文学史》(李小荣著)、《中国英国文学研究史论》(葛桂录著)、《冈仓天心研究:东西方文化冲突下的亚洲言说》(蔡春华著)以及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如《建阳刊刻小说研究》(涂秀虹著)、《明代中古诗歌批评文献及诗学研究》(陈斌著)、《台湾诗钟社团及相关组织考略(1865—2014)》(黄乃江著)、《〈说文解字六书疏证〉研究》(李春晓著)、《阿瑟·韦利汉学研究策略考辨》(冀爱莲著)的结项成果。集刊第二批出版的有《西方哲学与中国新诗》(雷文学著)等。这些成果在课题结项评审专家审定意见的基础上,再次打磨修订,因此保证了较高水准的学术质量。研究中心成员承担的福建省社科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的结项成果,也拟列入这套学术集刊出版。

中华文学传承发展研究中心

2016年8月

目 录

CONTENTS

导 论 / 1

第一章 中国新诗哲学精神的先驱 / 11

第一节 王国维:作为真理的诗歌观 / 15

第二节 鲁迅:超越现实的形而上追求 / 24

第二章 中国新诗哲学精神的诞生 / 37

第一节 郭沫若:泛神歌者 / 41

第二节 《野草》:悖论和虚无 / 62

第三章 中国新诗哲学精神的成形 / 73

第一节 冯至:形而上意义上的精神建设姿态 / 77

第二节 穆旦:常想飞出物外,却为地面拉紧 / 97

第三节 郑敏:神圣之境 / 110

第四章 中国新诗哲学精神的纯化 / 125

第一节 顾城:一个纯粹的形而上诗人 / 135

第二节 海子:作为真理的诗歌 / 150

第三节 戈麦:非观念的觉者 / 173

第五章 中国新诗吸收西方哲学后出现的变化 / 197

第一节 新的诗歌功能观:诗歌是追求真理的手段 / 200

第二节 新的诗人形象:觉者 / 219

第三节 新的艺术手段:象征 / 230

2 西方哲学与中国新诗

第四节 新的诗歌境界:崇高 / 241

附 录 哲学诗研究二节 / 247

第一节 论哲学诗与哲理诗的特征及价值 / 249

第二节 境遇诗与哲学诗 / 262

参考文献 / 273

后 记 / 278

导 论

诗歌与哲学的重要关系在现代人们用一个简明的命题来表达：哲学与诗歌是近邻。这种联系中重要的一环是哲学思想对诗歌品质的影响巨大。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是可以以任何内容为表现对象的，举凡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到国家大事、世界风云，小到迎来送往、草木虫鱼，均可以用诗歌来表现，都可以写出杰出的作品。但是，如果以生命和世界的最高存在作为表现对象，无疑可以极大地提高诗歌的思想内涵。反之，诗歌如果不参与对世界的根本解释，要想在境界上达到至高的程度是很困难的。从世界诗歌史上看，最杰出的作品无疑是崇高的思想结合完美的诗艺所诞生的产儿。

诗歌和哲学的紧密关系还在于它们同是解释世界的最重要、最完美的形式。哲学直接思考和解释世界，诗歌则用独特的形式将哲学思考的成果表现出来。用诗歌来表现哲学思考的成果不仅仅在于接受的愉悦性，还在于这种表现形式往往有理论语言不可替代的优越性——它在表达一个理念时往往超出了作者所给予的。这是因为，不确定的形象语言比明确的理论语言蕴含有更丰富、更细微的思想。诗歌表现真理不是教条式的，以诗歌来表现真理，在对真理表现的有机性因而是逻辑上的丰富性、潜在的可能性因而是更高级的准确性等方面有独到的优越性。

近代哲学更发现存在的本真言说为诗。诗并不是人们用来表达思想感

情的工具。诗歌不是一般的言说,而是存在的本真言说,诗歌看护了存在,是存在的家。诗歌与存在之间、与最高真理之间不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而是同一的关系。哲学与诗同一。在这一意义上,海德格尔强调“诗的本质是真理的奠立”^①。尼采认为“诗是人类最高的形而上的工作”^②,声称自己“已经把诗视为形而上的最高圆满状态”^③。解构主义在痛斥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高高在上的“超验所指”时,更将其哲学的理想寄寓在诗歌丰富的寓意中。

这一切都说明,哲学对诗歌创作是至关重要的。在提高诗歌的精神含量,扩展诗歌的思想境界,增加诗歌的艺术表现等方面哲学会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魏晋以及唐代诗歌的繁荣与道家思想、佛学的参与息息相关。近现代以来,中国新诗革命、新诗的发展、新诗的品格受到西方哲学(包括部分印度哲学)影响甚大,那么,西方哲学对中国新诗造成那些影响?中国新诗在西方哲学的影响下表现出什么样的美学品质?中国新诗因而与传统诗歌相比发生什么样的美学变化等等是值得探讨的诗学问题。

简言之,本书关心的是中国新诗在西方哲学影响下所表现的形而上学品质。

中国新诗发生在现代,是在西学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它不仅是语言形式上的革命,更是思想意识、思维方式上的革命。它表达的是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现代人的现代意识,这种意识的最高层次、最核心的精神内容无疑是现代生命哲学、形而上学。现代学者不约而同地发现中国缺少纯粹哲学传统。比如王国维认为中国缺少纯哲学,中国最完备的只有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④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史中只有纯理论兴趣之学说极少。”^⑤“中国哲学家之哲学,在其论证及说明方面比西洋及印度哲学,大有逊色。”^⑥朱光潜则认为中国人哲学思想平易、宗教情操淡薄,^⑦就是老庄,“比较儒

① 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郜元宝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页。

② 尼采:《我妹妹和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213页。

③ 同上书,第216页。

④ 王国维:《王国维文集》第3卷,姚淦铭、王燕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⑤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16页。

⑥ 同上书,第8页。

⑦ 朱光潜:《诗论》,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91页。

家固较玄邃,比较西方哲学家,仍是偏重人事。他们很少离开人事而穷究思想的本质和宇宙的来源。”^①而“佛教只是扩大了中国诗的情趣的根底,并没有扩大它的哲理的根底。”^②“受佛教影响的中国诗大半只有‘禅趣’而无‘佛理’。‘佛理’是真正的佛家哲学,‘禅趣’是和尚们静坐山寺参悟佛理的趣味。”^③这是对西方传统而做的结论。西方有一个强大的哲学传统,相对于东方和中国,这就是它的形而上学,是对不同于现世世界的另一个世界的揭示。中国古代也有形而上学,但中西形而上学是不一样的。西方的形而上学表现了突出的超越性,甚至与此在的世界发生断裂,虚无而不可捉摸。中国的形而上学在天人之间往返,最高真理与此在世界息息相关,甚至就是此在世界。西方哲学的超越境界可能是我们民族哲学没有见到的。

再者,中国哲学尽管从逻辑上讲具有超越性,但落脚点往往在人间生活。追求人间幸福和心灵和谐是中国哲学的目的,而不是宇宙真理;西方人则只把宇宙真理作为哲学的根本目的,人的幸福在他们看来不是最重要的,他们会为了真理牺牲幸福和生命,甚至主动将自己的生命献祭给最高真理,比如基督教里的亚伯拉罕就是这样一位人物。

最后,因为中国哲学注重人的幸福和心灵和谐,因而像悖论、虚无、深渊、死亡这样的问题中国哲学素不关心,但这些问题西方哲学却非常关心,认为它们是发现真理的重要途径。

由于以上原因,中国传统哲学和诗歌精神重点在于建设人在现世的生活,几乎没有诗人专以形而上的体验为创作对象。西方诗哲也表现现世人生,现世的人生只是作为其形而上思想的一个表现或例证,其落脚点在形而上学;中国哲学却将落脚点放在人在现世的生活,因而哲学最终道德化、政治化、人化,作为逻辑起点的形而上学终至于失去了自己的光芒。我们虽然不能用西方的哲学标准来看待中国的诗学精神,中国的诗歌也有自己独特的哲学精神;但是,人类面对的是真理,而不是不同民族各自不同的特点,当西方

① 朱光潜:《诗论》,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92页。

② 同上书,第92页。

③ 同上书,第98页。

哲学家对人类重大精神问题作出自己独到的发现,而这些发现又为中国所缺乏时,我们向西方的学习就是必须的。

第一个在这方面作出开创性贡献的是王国维。王国维有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他在亡国灭种的国难当头,在国人疾呼救亡图存之时,却喊出“纯哲学”的呼声。王国维从精研西方哲学中得到形而上学概念,并深信这一思想倾向的价值。他批评中国没有纯哲学,中国的哲学最发达的是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中国哲学家无不兼为政治家。^①王国维将纯哲学概念发展到诗学领域,把诗歌看成和哲学一样是对真理的揭示,哲学和诗歌的区别仅仅是,哲学发明真理,诗歌(包括其他艺术)用符号表现真理。以真理的追求(这种真理往往以一种残酷的形态表现出来,甚至与人的幸福相对立)而不是以人在现世的幸福为诗歌表现的对象,这无疑是全异于传统诗学精神的,揭开了中国诗学现代转型的第一页。王国维不仅是哲学家,还是诗人,他的诗词创作已经有相当数量表现对形而上精神的痛苦追寻,因而,新诗革命在他的时代虽尚未发生,他也不可能用新诗创作,但他的旧体诗词已经表达了新的时代精神、现代的精神,这一点可以无愧地使他成为新诗精神的重要源头之一。

可以说,中国近现代自从有了王国维,就有了纯粹形而上精神(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当时一大批思想家的兴趣均在于现实社会改造),这种精神无疑主要来自西方,是为精神而精神,是对于纯粹知识的探求,不存在现世目的。当然,这种纯粹精神的萌芽我们在更早的诗人中可以朦胧感觉到,比如在黄仲则、龚自珍、苏曼殊的诗歌中表现出的那种莫可名之的痛苦,就可嗅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而上精神前兆。但是,只有到了王国维,这种形而上精神才从哲学的角度得到自觉地阐发,并在诗歌创作中有自觉的追求。因而,王国维可视为现代中国形而上诗学精神的源头。

新诗对哲学精神的表现几乎在新诗一出现就产生了。五四诗坛上,郭沫若服膺惠特曼等人的泛神论,歌颂宇宙中那种遍在的“一”和创造精神;冰

^① 王国维:《王国维文集》第3卷,姚淦铭、王燕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心雅好泰戈尔的哲学,以为“宇宙和个人的灵中间有一大调和”^①;冰心并对基督教的“爱的哲学”非常倾心,这使他们的诗歌对现世人生的探讨上带上超验色彩。但是,无论是郭沫若还是冰心,他们都没有纯形而上的知识嗜好,郭沫若利用泛神论为他的个性自由伸张,冰心以泰戈尔的哲学救治她“天赋的悲感”,慰藉她“寂寞的心灵”。真理究竟是什么?他们都没有深入探索的兴趣。

五四诗坛的草创期过后,新诗诗人及理论家开始了对“纯诗”的探索,这种探索从新月派到随后的象征派、现代派一直没有停止。“纯诗”探索者们由最初对五四诗坛白话新诗创作粗糙的反拨,逐渐深入对诗学精神的思考,向哲学领域挺进,“诗要暗示出内生命的深秘。”^②“象征是对于另一个‘永远的’世界的暗示。”^③但是,这种纯诗探索在较早时期(20世纪40年代前)远未达到应有的思想深度;他们的作者虽以西方哲学和诗学为参考对象,但实际上对西方哲学的内核知之不深,甚至他们用西方哲学、西方诗学话语表达的往往是民族哲学精神。这种状况,再加上尖锐激烈的社会矛盾,动荡不安的个人生活,在20到30年代,新诗诗坛没有产生对哲学思想有深入沉思的诗人。这种状况直到40年代才有了改观。

20世纪40年代初,由于时代的机遇,中国一批优秀诗人和青年才俊相聚昆明。人才的集中造成的思想和艺术空气的活跃,相对安静的环境以及与国外诗学思想的息息相通,使得40年代的昆明诗歌创作呈一时之盛。尤为难得的是,他们的创作呈现整体性的对哲学思考的关注和爱好,这是以冯至、穆旦和郑敏为代表的现代派诗歌。在冯至的诗歌中,有对世界死亡和蜕变哲理关系的思考,有对世界泛神性质的揭示和向往,他并从凡俗的事物和普通人身发现神圣和博爱。冯至是在昆明郊外一处宁静的山野里进行他的哲学沉思的,诗歌精神和节奏深情而和缓,如地泉缓缓涌出;与之不同,穆旦的精神则显示了丰富的张力和紧张的痛苦。穆旦不同于冯至在一个安宁

① 冰心:《遥寄印度诗人泰戈尔》,吴重阳等编《冰心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56页。

② 杨匡汉、刘富春:《中国现代诗论》,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第99页。

③ 潘颂德:《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史》,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231页。

的环境中进行形而上沉思,他的大脑更多被现实问题占据,但是,他精神上形而上的冲动异常强烈,在他的那些表现现实的诗篇之间,不时冒出非常纯粹的形而上精神诗篇,这显示他的精神中有一条常在的形而上暗河,在他的精神深层强劲地暗流,并时时喷出地表。穆旦诗歌表现了对本真形而上生命的回归,对前生命的回忆,对现世生命的陌生感和异化感。《诗八首》等诗歌显示,他对世界的终极本质有着深刻的觉悟,他极力从可感的爱情活动中暗示不可感知的绝对精神,通过最丰富的爱情的幻变暗示绝对精神的不变。穆旦的形而上体验是深刻的、纯粹的。哲学专业出身的郑敏更自觉地以哲理入诗,郑敏像一位圣母,她常以神圣的视角去看待宇宙万物,万物在她的笔下呈现出一种神圣的、受难的美。

冯至、穆旦和郑敏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新诗有了真正的哲学精神、形而上精神,这种精神是受惠于西方诗哲歌德、里尔克、艾略特等人的结果。他们的诗歌显示他们对终极问题产生兴趣,他们要以诗歌为武器努力探寻存在的奥秘,诗歌成为揭示真理的形式,这正是王国维当年的诗学理想。至此,中国形而上诗学理想从理论到实践上初具规模。

然而,我们在历史逻辑的梳理中不可忽视例外的情况,这就是鲁迅。鲁迅有成熟的哲学诗,这就是他的《野草》。他的例外在于他的充满哲学奥义的散文诗出现时间之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前期,此时新诗刚刚走过自己的草创阶段,穆旦还在自己的童年,冯至也刚刚成年;再者,这些迷人的哲学诗篇是以“散文诗”这种形式中表现出来的。鲁迅《野草》的成功创造与散文诗这种体式的自由性有很大关系(也许用分行新诗在如此早的时期创作出同样质量的作品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散文诗的基本精神仍是诗的,是诗歌大家族的一员。这样,我们在兼及它的特殊性时仍将它作为新诗来探讨。《野草》中的《墓碣文》《影的告别》《过客》《死火》《希望》《题辞》等篇,生存悖论触目可见,虚无主义兀立其中,而在这种困境中诗人意志弥坚,拷问不绝,充分展现了作者对形而上精神开掘的深度,这是鲁迅受尼采、克尔凯郭尔等西方哲学家影响的表现。鲁迅从一个时代中兀然耸起,展示了巨人的风采。

但是,无论是冯至、穆旦、郑敏还是鲁迅,中国新诗在现代体现的形而

上哲学精神是不彻底的。严酷的现实环境每一个作家不得不面对,他们即使有形而上的倾向,也不能全心感悟于此。鲁迅是现实主义作家,玄学不是他主要的目的。不但他的小说、杂文、散文是严格的现实主义作品,就是薄薄的一册《野草》也不全是表现哲学体悟的。冯至由于因缘在宁静的昆明郊外写出《十四行集》,但之后即转到城中居住,写作也转向杂文,《十四行集》几乎成为他的著作中的一个孤立的文本。郑敏在写完《诗集:一九四二—一九四七》后就去美国留学,中断了诗歌创作。穆旦则是心顾两头,而现实性的内容仍然占据了他诗歌的大部分比例,他虽有强烈的形而上冲动,但在事实上却不得不面对现实,“常想飞出天外,却为地面拉紧”(穆旦《旗》),这不仅仅穆旦个人的精神写照,也是这—一个时代有形而上追求的诗人共同的精神写照。因而,纯粹的形而上写作需等待另—种时代空气。

这个时代在新诗经过长时间的几乎停顿的创作后(“文化大革命”有些地下写作)终于来临。20世纪80年代,人们享受了难得的精神解放空气,而生存危机的压迫也亦解除,这使得—批诗人精神单向突进,心无旁骛,直入形而上精神,他们的代表者是顾城、海子和戈麦。

这是一批不食人间烟火的才子。在顾城、海子和戈麦等诗人那里,我们看到了中国新诗最纯粹的哲学精神。在这个时代,社会问题并不是不存在,新旧思想的激烈交锋有似于五四,但他们对这一切似乎视而不见(顾城只有短暂的社会写作);他们生活在这个时代,被这个时代自由的精神所鼓舞,却超越于这个时代,终生追问天外之思,只问这个世界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存在究竟是什么。他们的兴趣在此,从而成就了诗学精神的纯粹与深刻,直可与西方某些诗哲相提并论。

据顾城自己讲,他在五岁的时候,有一天一个人关在屋子里,突然明白有一天他会死去,将像白石灰—样涂在墙上。这种突悟给了他深刻的绝望,他终生不能摆脱这种绝望体验,多次谈到他的童话、诗歌和哲学与死亡的深刻关联:“我喜欢童话的另—个原因,跟那种空虚的压迫是有关系的,我的自性由于恐惧而收缩,由于童话而解放。”“哲学也是在不断受挫受伤而产生的